

北宋目录学研究

白金著



人民出版社



北宋目录学研究

白金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宋目录学研究 / 白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01-013444-4

I. ①北… II. ①白… III. ①目录学—研究—中国—
北宋 IV. ①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1896号



北宋目录学研究

BEISONG MULUXUE YANJIU

白金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37千字

ISBN 978-7-01-013444-4 定价：5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宋代目录学发展的背景	(11)
第一节 宋前目录学	(11)
第二节 繁荣的北宋文化	(32)
第三节 北宋的图书出版与官私藏书	(45)
第四节 北宋的馆阁与图书管理	(54)
第二章 北宋的目录编纂	(70)
第一节 官藏目录	(70)
第二节 史志目录	(99)
第三节 私人藏书目录	(112)
第四节 专科学目及特种目录	(121)
第三章 《崇文总目》研究	(169)
第一节 《崇文总目》的编纂	(169)
第二节 《崇文总目》的体例	(192)
第三节 《崇文总目》的分类思想	(206)
第四节 《崇文总目》的版本流传情况	(229)
第四章 《新唐书·艺文志》研究	(253)
第一节 《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	(253)
第二节 《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体例	(262)
第三节 《新唐书·艺文志》分类方法	(275)

第五章 北宋目录学的成就与学术特点	(288)
第一节 北宋目录学的成就	(288)
第二节 北宋目录学的学术思想特征	(303)
结 语	(319)
参考文献	(322)
后 记	(334)

引 言

北宋是我国古代社会由中古到近古转变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影响了文化知识形态、社会思想潮流的进步与变革。以宋学崛起为特征的儒学复兴正是这些变化的重要体现。

儒学繁荣带动了经书文献的整理工作,北宋士人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读经、注经热潮。真宗朝,在官方的支持下,邢昺主持校订群经,成为宋初经学文献整理工作的一次盛举。至仁宗年间,以胡瑗、欧阳修为代表的学者,大兴疑古之风,对中国近古以后的学术思想、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与疑古之风紧密联系的辑佚、辨伪之学也一时大盛。北宋中叶,新学、道学相继崛起,儒、释、道三家的融合最终完成,促使学术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在学术发展、融合、斗争过程中,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经学家往往通过新校新注儒家经典来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随之产生的大量古籍整理工作有力推动了文献学的发展。除整理经学文献之外,北宋官方对图书事业的全面重视,也促进了文献学的大发展。宋代立国之初,尚在东征西讨统一中原之时,即注重搜集图籍,每平定一地,必尽收其图书,运往汴京,充实三馆,还多次颁布法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新中国成立不足20年,国家藏书已数倍于建国之初。同时,宋朝政府还着手编纂、整理、刊刻图书。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北宋初年编纂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四大类书,以及《大藏经》、《道藏》等大型丛书。这些文献整理性质的工作无疑为宋代文献学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诸分支学科在内的文献学研究在宋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宋初学术活动的需求,官方整理图籍行为的推波助澜,雕版印刷术的成熟,使图书出版业日益繁荣。宋代生产的书籍数量大增,书籍所涉及的学科门类也更加广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代目录学大量吸取前人的学术成果,呈现出更为多样化、更为系统化、更具理论性的发展趋势。概括地说,

宋代目录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编目实践上,宋代编纂的目录数量众多。今据《宋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秘书省续四库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等统计,约有120余种部,800余卷。类型包括国家藏书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以及各种专科目录。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相比的。其次,从学科命名上来看,“目录学”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正式出现。历史上目录编纂与研究虽然早已出现,但未有人正式提出“目录学”这一概念。宋人苏象先《苏魏公谭训》卷四云:“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①此为“目录学”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最后,宋代学者并没有固守已经定型的四部分类法。虽然《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等官方目录采用了四部分类法,但也并非一味株守前人成说。在小类的划分、具体的图书分类、部类名称的取舍等方面,宋代目录学都表现出它独特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官方学术思想代表的四部分类法,在宋代也受到了挑战。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目录学家不断尝试一些别出心裁的分类方法,如《龙图阁书目》所采用的六分法、《邯郸藏书志》所采用的八分法。至南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的《通志·艺文略》、王应麟《玉海·艺文》等均非四部分类法。可以看出,目录学正在守成与求变的交锋中前进。最后,从目录学的理论成果来看,自东汉刘向父子开始,目录学已经发展了一千余年,其间分类法几经改革,编纂体例不断完善。遗憾的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在理论上对目录学的发展进行总结。目录学成果仅仅停留在目录的编纂上。把编目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且与学术发展更为紧密的联系起来已成当务之急。目录学的理论建设就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发展,至南宋终于取得重大突破。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对分类方法的论述,即为对此前一个阶段目录学发展的一个总结,是目录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理论著作。

选择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这一时期进行研究,其意义在于:

第一,目录学是学术发展情况的直接反映。对北宋目录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到北宋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北宋处于唐宋变革期的重要节点上,北宋学术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北宋目录学学术价值非同一般。

^① (宋)苏象先:《苏魏公谭训》卷四,见《苏魏公文集》附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41页。

第二,北宋编纂的目录数量众多,历代虽有不少学者曾有论述,亦有学者试图全面系统地对北宋编纂的目录著作进行考述,但直到今天,仍未有一人能全面考察这些目录的编纂经过、著录内容、编纂体例、分类思想等重要学术内容。甚至有些重要的目录著作,从未被古今学人所关注。对包括官藏书目、私藏书目、特种目录、专科目录、佛道两教书目在内的北宋目录著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考察,可以使我们对北宋目录编纂实践的具体面貌有更为准确的认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北宋目录学的特点、理论发展及其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供基本的文献参考。

第三,目录学历经近千年发展,进入到隋唐时代,无论是分类思想还是学术理论,都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在北宋时期,随着学术的发展,隋唐时期所确立的目录学思想体系已经逐渐与北宋学术发展状况不适应。因此,宋代目录学家在编目的同时,对目录学中的图书分类法、理论思想等核心内容都作出了一些改进。这些变化对目录学在宋代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目录学在北宋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深入考察,即是对中国近古目录学源头的研究,这对了解中国宋代以后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宋代目录学成就非凡,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理应有其相应的学术地位。但是,很久以来它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关于宋代目录学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空白。

首先,对北宋目录学理论与发展史的研究并不充分。传统目录学发展到宋代,进入了理论总结期,郑樵《通志·校讎略》的出现,基本完成了对汉魏到隋唐时期传统目录学发展的理论总结,是传统目录学里程碑式的杰出著作。这个总结的过程,从四部分类法在隋唐间得到确立就已经开始,直到宋代,随着学术思想的变革,目录学理论也逐步升华,历经整个宋代方才完成。因此,宋代目录学的发展历程,就是目录学理论逐渐成熟的过程,在目录学理论思想史上应该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传统目录学思想史研究多年来整体低迷,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内,很少有对目录学理论与学术史进行独立研究的论述与著作。宋代目录学思想史中这重要的一点,也没有得到重视,这足以影响到对宋代目录学,乃至传统目录学的整体认知。

目录学,甚至文献学经常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的。虽然编目活动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工具书的特点导致了它很少被人们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仅仅是作为人们求学问道的引导而存在。因此,自古以来对于目

录学理论与目录学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成就。关于这一点,周祖谟曾说:“以往专门讲述目录学的书籍并不多。虽然有关历代不同目录书的特点,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也不乏有人评论,但是能贯穿古今,洞察原委,明其意蕴者只是聊聊数家,而且没有综核群言,通论是非,启导学者的专书,这是很大的缺失。”^①这段话说出了目录学研究的尴尬状况:长时间停留在对具体目录的评论与研究上,缺乏贯穿目录学历程的学术史著作。遍考中国目录学著作,除了郑樵《校讎略》可谓理论著作之外,从北宋到清代乾、嘉之前,从未有人从目录学发展史的角度或者从目录学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目录学做全面的研究。《校讎略》对目录学理论的阐述,也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分类方法上,并未涉及学术思想史,亦未论及目录学史等内容。直到清代乾、嘉之后,目录学史方才在目录学家那里得到了相对的重视,于是出现了“目录明,方可读书”;“艺文志者,学术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之类的推崇之语;出现了如章学诚与《校讎通义》这样系统研究这类学问的专家及专著。即便如章著,对目录学理论的研究亦不过借对《汉志》的研究来证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而已,并无对目录学思想史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及至晚近,目录学史才逐渐被个别学者拿来作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部:一为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著对目录学的意义、目录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目录类例的沿革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使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概况。而姚著内容更为详尽,除了涵盖余著的内容之外,尚有不少开拓创新之处。这两部著作的出现,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中国目录学史的发展概况。遗憾的是,此两种著作并未对目录学思想史的发展做专门论述,也没有将目录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与学术思潮联系起来,对目录与学术之间的关系的叙述也没有超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范畴,无法使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认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

对于宋代目录学的研究,古今著作并不很多。上述余嘉锡、姚名达两种著作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宋代目录学史内容。《目录学发微》在《目录学源流考》一节中,曾简单述及宋代目录学,但所论不过是宋代馆阁校书与目录编纂情况,对于宋代目录学理论的发展无任何论述,甚至对郑樵的《校讎略》亦

^① 周祖谟:《〈目录学发微〉前言》,见《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无详细评述。今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则对宋代的校书情况、目录的编纂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然并未过多的论及目录学思想史的内容。与姚名达同时的汪辟疆曾撰《目录学研究》一书,对目录学发展论述虽颇有学术史之意味,但其将唐宋元明清之目录学合并论述,较为粗疏。直至当代,对宋代目录学的研究仍停留在对一目一录的分析研究上。台湾乔衍琯曾著《宋代书目考》,对两宋部分目录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考证。但涉及北宋目录的研究仅有《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邯郸书目》、《国史志》以及几部佛经目录,既未能全面梳理北宋目录的编纂盛况,亦未能对目录学之变革进行阐释。20世纪后半期,这种情况略有改观。王重民、吕绍禹、彭斐章诸先生开始有意识的探研目录学思想史,不少古代学者的目录学理论被系统研究。这为今后全面研究目录学思想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乔好勤先生出版了《中国目录学史》一书,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发展的分期,并把目录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受到了学术界普遍认同。稍后,余庆蓉与王晋卿二学者撰有《中国目录学思想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阐释中国目录学思想史的著作,是20世纪末目录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著作之一。2006年,张富祥先生出版了《宋代文献学研究》一书,其第一章对宋代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宋代目录学理论成果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在此方面最为全面系统的论述。除此之外,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对北宋目录学做过研究。江新华、拓夫所撰《从目录学名著看宋代目录学成就》,从目录著作的编纂入手,论述了北宋目录学的繁荣景象。更多的论文则关注个别目录学家或者目录学的某个角度,无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或论文。总体来说,宋代目录学的研究不够充分,尤其是在宋代目录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尚有不少可以深入开掘的地方。

其次,对宋代目录著作的研究。宋人编纂的目录学著作并未得到全面细致的研究。相比《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存世目录著作来说,宋代目录著作除了郑樵的《通志》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外,其他如《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兴馆阁书目》等几部重要的存世目录,虽有少量论文进行一定的研究,但多为浮光掠影的叙述,或者仅为普及知识性的泛泛而谈,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作为研究宋代目录学的最基本文献资料,这方面研究的缺失,使对宋代目录学的更深入研

究缺乏足够的文献基础。由于北宋藏书目大部分皆以亡佚,仅有《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两种得以保存,今人对于北宋目录著作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二目。

《新唐书·艺文志》由于被认为是接续《旧唐书·经籍志》而成,故历来不甚受重视,除了缪荃孙曾撰《〈新唐书·艺文志〉注》之外,关于《新志》的系统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故罗振玉曾说:“《新唐书·艺文志》实可与《隋志》比方,窃怪今人于马考、郑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犹研习不已,而此志顾少究心,殊为怪事。”直到近现代,《新志》仍未得到学界重视。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介绍了《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的成书经历,唯独细说《新志》的编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史志”篇中,对《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有专篇介绍,也没有详细讲述《新唐书·艺文志》的情况。近代关于《新唐书·艺文志》的相关研究著作有唐景崇的《〈唐书·艺文志〉注》,此书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惜未能见到。而目前关于《新唐书·艺文志》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著作作为台湾杨果霖所著《新旧〈唐书·艺文志〉研究》。该文通过校勘、比较的方法,对《隋志》、《新志》、《旧志》的编纂、著录情况进行了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运用数字计量的方式比较新旧《唐志》在著录文献方面的差异,厘清了各目的演变关系,并针对各志所著录书籍的亡佚、增补情况作了分析。同时,还附带性地对其中涉及的学术史内容做了论述,虽吉光片羽,但亦颇有价值。缺憾在于作者并未对新旧《唐志》在分类方法,以及分类思想上的差异做研究。尽管如此,此文仍不失为《新唐书·艺文志》研究的巅峰之作。

大陆方面,对《新唐书·艺文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对著录内容的考证和辑补。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张固也的《〈新唐书·艺文志〉补》与陈尚君所辑补的《〈新唐书·艺文志〉补》。这两项研究辑补材料丰富,大大弥补了《新唐志》在著录文献上的缺憾,参考价值极大。此外蒋寅的《〈新唐书·艺文志〉札记》、徐进《〈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小考》、张固也《论〈新唐书·艺文志〉的史料来源》、赵庶洋《〈新唐书·艺文志〉校误》等从《新志》的史料来源、著录的疏误等不同方面对《新志》作了考证。而从目录学意义上进行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较为重要的有周少川《〈新唐书·艺文志〉在史志目录上的贡献》。该文对《新志》的分类方法和

著录方式做了简要的分析,但对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的关系仅用一句话概括,并未展开讨论。而桂罗敏的《唐书经籍艺文志目录类证辨》则研究了子部的一个小类“目录类”的著录情况,其目录学层面上论述并不多。除此之外,某些文献学、目录学著作中对《新志》也有简单的介绍,如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编》、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等。有关欧阳修的研究著作中也偶有提及,但所论皆为断篇残简,不成体系。

对于《崇文总目》的研究,最早当属郑樵《通志·校雠略》中的论述。郑樵对《崇文总目》提出了不少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崇文总目》不记载亡书,会使后人不便稽检。他在《编次必记亡书论》中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易学,求者亦易求。……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唯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①第二,郑樵认为《崇文总目》的叙释太过繁琐而无意义,不如不释。《校雠略》“泛释无义论”、“书有不应释论”、“书有应释论”全面阐释了书目中解题、注释的处理方法。如《书有应释论》中说:“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②郑樵的观点曾经颇为学者所认可。然深入考察郑樵所论,其中颇有不妥之处。首先,关于书目必记载亡书。《崇文总目》的性质为国家藏书目录,这决定了《崇文》所著录的文献必定为馆臣所能过目的图籍,至于亡书,不应归入此目收录范围。所谓书目必记载亡书的说法,并非一条放之所有目录皆准的守则。其次,关于《崇文总目》叙释繁琐的缺点,也应该辩证地看待。由于此目出自众手,编者水平、态度良莠不齐,故部分提要质量不高,对书籍内容的叙释泛而空,并没有论及全书的精华,时人对此亦多批评。但《崇文总目》并非每篇提要均如此。欧阳修、曾巩、苏颂等人的文集中,都有一些当时校书的叙录,其中不乏考证扎实、论述严谨的精品。从目前残存的《崇文总目》来看,该书确有一些提要对书籍内容、流传情况记述详尽,考证翔实。如:

琴谱 十三卷

原释:唐陈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谱十三卷,宫调二十章,

① (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

② 《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第835页。

商调十章、角调五章、徵调七章、琴调五章、黄钟十章、离忧七章、沈湘七章、侧蜀七章、缓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谱散亡，今书旧目有琴调六章、琴谱一卷，残缺无首位，所载乃楚角、宫、黄钟、侧蜀、琴调数篇，余皆亡。^①

这一条著录对书籍的作者、书籍的内容，书籍的散佚情况，以及作者的所有著作都有介绍，言简意赅，其中保存的资料，对相关专业的研究来说是相当珍贵的史料。

简而言之，郑樵认为是否应该撰写提要不该一概而论：“《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与不可。”^②此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不同目录的性质。目录有简明书目与提要目录的区别。自班固删《七略》而成《汉志》以后，史志目录不录叙释或者简录叙释已成惯例，因此《新志》没有叙释，是为简明书目，这也保持了全志体例的一致。而《崇文总目》乃提要目录，全志皆有叙释，倘若此条有叙释，别条无叙释，对全志体例亦是一种破坏。再者，郑樵所谓“不应释”的观点亦有不妥。凡书皆有作者，或知或不知，可做简单考释；凡书皆有内容，或详或简皆可简要介绍；凡书皆有版本，亦可做简单叙述，为何会有“不应释”之说？故余以为，郑樵对《崇文总目》的这个批评并不恰当。《崇文总目》的提要或许有撰写不精的缺点，但并不存在“不应释而一概释之”的情况。

自郑樵以后，关于《崇文总目》的研究并不多。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对《崇文总目》的辑补上。《崇文总目》最初编纂时为66卷本，宋室南渡之后，图籍散佚严重，为了搜访图书，遂于绍兴年间将66卷本《崇文总目》的提要全部删去，仅保留书名，于是有了一卷本的《崇文总目》，陈振孙《解题》、晁公武《读书志》所著录皆为此本。在南宋尚未有缺失。郑樵、王应麟，甚至宋末元初马端临都有引用。此后原本逐渐亡佚，明清两代，仅有此一卷本流传。故明清以后，对《崇文总目》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其原本的辑佚上。近现代以来，对《崇文总目》的研究亦无太大进展。姚名达、余嘉锡等大家皆未对《崇

①（宋）王尧臣撰，钱东垣辑释：《崇文总目》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②《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第835页。

文总目》有过深入研究,其著作中仅对成书过程有所介绍,目录学意义上的研究极为罕见。至当代,《崇文总目》在全国的研究依然不温不火,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理论视角都缺乏新意。乔衍琯在其《〈崇文总目〉考略》、《〈崇文总目辑本〉勘异》两文的重点不在于目录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更近于版本学研究。张围东的《宋代〈崇文总目〉之研究》一书叙述了宋代官修目录的发展,又从宋代藏书、《崇文总目》与馆阁制度、《崇文总目》的纂修、《崇文总目》的分类与评价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崇文总目》最系统最完备的研究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后写道:“目录是书的历史,而目录学的发展就是学术史的发展。”可见作者已经注意到了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的紧密关系。张富祥《宋代文献学研究》一书第二章《目录学》中“四部分类法的发展”一节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佛”、“道”二类图书被《崇文总目》纳入子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学术史与目录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虽然囿于其书的性质和篇幅,作者并未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但其研究方法和思路,足以给我们今后研究带来启发。

与北宋目录编纂的整体情况相比,今天的研究成果仅涉及了北宋目录著作的一小部分,如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龙图阁书目》等不少重要目录很少有学者论及,这是北宋目录学研究一大空白。

最后,学术思想史视角下的北宋目录学研究。传统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与现代图书馆学意义上目录学有极大的差别。中国传统目录学自其诞生伊始,就被赋予了记录学术史的重任。至清代,章学诚总结出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点明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强调文化学术价值的特点。因此,传统目录不仅记载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存佚情况,更通过图书分类方法,留下了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的痕迹,与中国学术史关系非常密切。至清代,目录学地位有所上升,治国学者,皆为杰出的目录学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叙》中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①余嘉锡亦称:“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

^① (清)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之皆辨章学术也。”^①汪辟疆更是把目录学与史学并称,认为“目录之学,与史相纬;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源流,及一家一书之宗趣。”^②范文澜也把目录学与史学同等对待,指出《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是一部可贵的古代文化史。因此,将目录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目录学、学术史来讲,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遗憾的是,虽然有学者曾涉及这一问题,但尚无专门的著作或论文对宋代学术思想与目录学进行综合研究。

为了弥补北宋目录学研究中存在的上述缺憾,本研究将以北宋目录著作的剖析研究为基本切入点,以《七略》、《隋志》、《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重要参照系,在全面分析北宋目录著作的编纂方式、编纂体例、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明确北宋目录学的历史定位,进一步系统总结北宋目录学在学术理论方面的成就,突出呈现北宋目录学在目录学发展史上体现出的过渡性特征。由于目录学与社会文化、时代学术思潮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北宋目录学相对于宋前目录学的诸多变革几乎都受北宋学术发展演变的影响,这是北宋目录学发展的深层原因。因此,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思想史、学术史与目录学之间关系的探究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也是体现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术精神的重要途径。以文献爬梳为基础,重视理论总结与概括,适当扩大研究视野,择取新的研究视角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四者的结合,不仅能全面的研究北宋目录学,更能以此为鉴,透析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演进,这是古典目录学的精神。

①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见《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汪辟疆:《读书举要》,见《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第一章 宋代目录学发展的背景

第一节 宋前目录学

汉代以后,目录学的发展历经了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汉魏时期从刘歆创制《七略》开始的六分法阶段;另一个是在隋唐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四部分类法阶段。在这两个相对稳定期之间,是延续了整个两晋南北朝的图书分类法转变时期。五代以降,汉学势衰;以疑古起步,宋学崛起,市民文化盛行,释、道两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宋代文化思想体现出与此前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自隋唐以来趋于稳定同时也略显保守的目录学进行一场变革,以适应学术思想的发展。宋代目录学在坚持四部分类法为主流的同时,开始在分类方法的细节调整、著录体例的完善等方面作初步尝试,并在理论上对目录学的发展进行总结,最终在南宋出现了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之作——郑樵的《校讎略》。宋代目录学的这些发展变化,有社会文化发展的外部推力,当然也有文献学、目录学自身学术进化的内在因素。因此,理清从汉到唐的目录学演进过程,把握其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研究北宋目录学,更有助于我们研究目录学在唐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变革路径。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目录学

目录的出现时间尚无定论。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中说:“夏商亦有典籍与目录否乎?曰:有,有。”^①然其论述却仅云其时已有典

^①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籍,以及夏商两代已经开始对典籍进行有效的管理,并未提出任何有关夏商目录存在与否的证据,因此说目录产生于夏商时期,缺少实证。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目录真正出现的时间当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称“目”或“序”。《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①颜渊这里所说的这个“目”是为条目之义,虽与今天的群书目录或一书目录在意义上有所区别,但已经具有条别异同的职能,可视为目录产生的源头,其时在春秋战国之际。

战国晚期至秦朝,虽有图书分类而没有关于目录存在与否的明确记录。今天我们所能确切考证的最早目录当为汉初所编《兵录》。《汉书·艺文志》云:“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朴拊摭逸遗,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②张良、韩信所谓“序次兵法”,已具有明显的编目意图。至于军政杨朴所奏上之《兵录》,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目录。最早的综合性目录则为《七略》。《七略》乃刘歆在其父所编《别录》基础上编纂而成。《汉书·艺文志》云:“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辑。”^③阮孝绪《七录序》云:“(刘向)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④《七略》今已不存,但《汉志》是在《七略》基础上删去叙录而成,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七略》分类体系的原貌。从中我们看出《七略》在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七略》对目录学的最首要贡献在于它确立了古典目录学的体制规范。正如余嘉锡所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

①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二,(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62页。

③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④ 《广弘明集》卷三。第36页。